

读史阅世

闽台史话

《癸卯东游日记》：林炳章开福州实业救国之先

涌泉寺的闽台法缘

□杨祖荣 吴舒樱

□周至杰 江蕾 文/图

中国近代名人日记为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留下了重要史料,仅有书可查的便有三四百部,而关于“东游”“日本”就有三四十本。其中《癸卯东游日记》便是当时国人了解学习日本的重要资料。为后人所熟知的是,该日记是状元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应邀参加日本大阪博览会时写下的考察记录。这本日记对日本工、农、商、学、兵、政均有论述,其认为日本近世发达之原因,首在教育,其次工业,“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但鲜为人知的是,近代侯官人林炳章在同年游历日本后也写过一本同名日记,其中关于实业与教育等观点,与张书不谋而合。

林炳章,福建侯官人,字惠亨,为林则徐曾孙、陈宝琛之婿。林炳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授翰林院编修。曾奉命回闽考察宪政,协助陈宝琛办学,并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去毒社”社长等职位。民国成立后,就任福建军政府盐政监督、财政厅厅长、闽海关监督等职。

从林炳章的生平可以看出,他处于新旧交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让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挤压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渴望通过创办实业、振兴工商来挽救国家。林炳章就是当时实业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林炳章是如何从大清官员转身投入实业浪潮的呢?我们可从他的《癸卯东游日记》说起。

林炳章日记名为“东游”,实际上他的出游却是始于“南洋”。1902年,华侨领袖黄乃裳回闽招农,林炳章便借此机会出国游历以增长见闻。同年,林炳章跟随黄乃裳到南洋考察开发垦地的情况。日记开篇即说到,林炳章对南洋华人工商业蓬勃发展的景象深感欣慰,



陈宝琛为林炳章东游日记题字。

“见其善于殖民,雄于商战,喜吾海外民族兴盛之可期,而悼宗国羸弱之无术”。百闻不如一见,他认识到要通过“商战”和发展实业,才能实现国家富强。

也正是在南洋考察之旅,让林炳章愈加想要走出国门。1903年,林炳章受日本大阪博览会之邀,同时也应陈宝琛嘱托为福州师范学堂考察日本教育并聘请教员,旋即开启了历时两个月的日本“东游”之行。其间,林炳章参观了博览会,考察了日本幼稚园、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教育机构,同时还考察了博物馆、图书馆、印刷局、官报局、陆军参谋部、士官学校等机构的情况,意识到中国兵力之弱在于“国不爱兵,兵亦不爱国,人皆轻武,武亦恒自轻勇”。接着,他指出中国之富强的关键,“中国今日强必自教育始,富必自实业始,自余皆未也”。这与张謇不谋而合。自此之后,开设工厂兴实业之先,创办学校以培育实业人才,实业救国便是林炳章的人生目标。

电灯是电气时代的典型成就,林炳章首先通过“电灯”点亮了福州

的实业道路。中国人最开始投资电灯事业的是1890年以黄秉常为首的华侨资本组成的广州电灯公司,福建最早的电灯厂则是1900年孙逸集集资万两创办厦门电灯厂。1901年《时报》曾有报道,“闻厦门某巨商以福州各处行店多用洋油,致遭火患,拟集股向福州创设电气灯公司一所……据言该电灯每夜点至十二点钟止,较点洋油价不过略昂少许”。可见当时已有商人欲在福州开设电灯厂,但均未成功。

林炳章在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时曾见识到电灯对于照明颇好处。1903年7月22日,他在参观工业、商业二馆后,天已微黑,然“范场万灯如昼,表里通明,喷水亭内更以五色电环绕其中,望之如天半彩虹,发人遐想”。又鉴于福州因使用油灯而经常酿成火灾,1906年林炳章在苍霞洲银元南局创设福州电灯公司。这便是福州第一个新式的电灯公司。

为了募集资金,林炳章曾与商务总会的诸人协商,提出“仿照浙江铁路公司办法,分为整股零股二种”的办法,可惜最后因为资金等问题,电灯厂未坚持多久便停办。虽然电灯厂创办失败了,但林炳章开辟了福州人自己开办电灯事业的先路,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例如1911年,有着“电光刘”之称的刘氏家族中的刘崇伟联合福州名流林长民等七家股东开设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发展规模大,成为刘氏家族的核心企业。

林炳章创办实业不仅“福州第一”,更创下过“中国第一”。当时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国人不仅兴办实业,而且多次掀起“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在福州抵制日货风潮甚烈的背景下,怀抱“实业救国”宏愿的林炳章便与陈培锷及福州巨商集资在夏道建立了福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任命其留学日本化工专业的弟弟林恩溥为董事,先是开设酒精厂,而后增加制革厂。

福建实业公司酒精厂便是国人开办的第一个酒精厂,“实为吾国破天荒之举”。在此之前,中国的酒精绝大部分都是自外国进口。而国人的工业化生产酒精技术也都掌握在少数的外国人工厂中,仅有1906年俄国人在哈尔滨、波兰人在阿城开办的酒精厂。现代生物学家先驱谭熙鸿曾说道,“吾国战前,每年酒精输入量约五百万加伦,国人自制酒精,尚以民国九年(1920年)设立之福建实业公司酒精厂为最早,继起者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之山东博益酒精厂”。福建实业公司先后在福州、闽清、建瓯等地建设酒精厂,利用氧化法“创制无水酒精与纯粹酒精两项货品”。但这些酒精厂因成本太高,难以与进口酒精竞争,最后倒闭。

由上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长期受到外资排挤,难以发展。故,近代中国实业之展开一直都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因此林炳章兴办实业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爱国烙印。民国后,在实业浪潮下,成立了许多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为宗旨的实业团体。而林炳章开办电灯厂和实业公司,其意图也都是以期“分洋人之利,以保国权”。在开设电灯厂时,林炳章曾公开招股十万,以购置电灯与发电机。他将股票分成四份,“官二成,商二成,铜元局机匠二成,民间二成”,不收外国资本以免股权被控制,即“股票自开办之日起,周年付息八厘,不收洋股,以免利源外溢”。

除此之外,在保护矿权方面,林炳章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中日甲午战后,福建沦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的路矿权一直虎视眈眈,采取各种方法进入矿产地区进行勘探和申办公司。1903年8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田康哉向清政府提交照会,称:“照得兹有本国人拟在福建省龙岩州一带地方,与中国商人合伙开矿,不日转派人员来京,禀明一切。”1916年4月16日,福建督军李厚军任命林炳章为福建省财政厅

长。此时矿务为财政管辖,林炳章深知“实业之中,收效最宏,致富最易的,莫如开矿”的道理,遂计划开采矿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抵制日本侵占福建矿权的企图。

他上任后,便派梁津、陆钦颐两位技术员赴各县勘察,进行实地试验。同时通过印刷矿例、绘制矿图分给矿业界等方式,提倡、鼓励国人自己办理矿务。林炳章下令编辑《福建矿务志略》一书,全面汇总了福建矿产资源,还编印了福建省地质图和矿产图。“其陈述大旨,欲使已开各矿日形畅旺,未开各矿次第朝廷,洵足以提倡国民,引起资本家之注意”,希望通过兴盛福建的矿业,使之“数年或十数年后,闽省矿业或能渐次发达,收天地自然之美利,绝外人窥伺之萌芽”。

林炳章在审核矿业公司施工计划、开采情形之时,发现由于缺乏学识和经验,存在着很多未聘矿师,仅用土法尝试,或采掘地点与矿床位置不合规的情况。林炳章为此发布劝谕,希望各公司聘用专门矿师,或是本国留学东西洋专业矿科及国立矿科大学的高等毕业生兼有经验者。为此,他大力开办矿业教育培养人才,以此帮助矿务更好地发展。设立了矿业讲习所,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规定3年毕业,以陆钦颐主持教务,共开办二期,毕业生共有70多人,为后来中国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

林炳章著《癸卯东游日记》为其实业救国思想之始,兴办电灯厂、酒精厂等为其实业救国之行,保护利权、培养实业人才为其实业救国之绩。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林炳章开福州实业救国之先,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护本国利权,抵抗外资侵略,谋求民族工业的长远发展,用实际行动传播了利权意识,彰显出近代福州人赤心奉国的时代风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说史谈儒

朱子手迹“四个之本”立德智慧

□陈苏珍

朱子手迹“四个之本”饱含朱子齐家哲学的立德智慧。“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四块板联,现存于尤溪县博物馆,每块长1.96米、宽0.35米,为杉木阴刻,落款“晦翁”二字。据考证,为朱子于中晚年手迹。上世纪80年代在尤溪县被发现时,首联“读书起家之本”已遗失,后为新集字。“四个之本”虽仅24字,却蕴藏着关于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丰富的立德智慧,给现代人以无尽的启迪。

首联“读书起家之本”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家庭必定以重视读书为起点。如果说物质富裕是家庭的经济保障,那么读书则是家庭关于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持。朱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读书人”,不仅十分重视读书在家庭立德实践中的效用,更是把读书作为修德的必要方法和途径。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子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分歧,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与朱子在江西鹅湖寺探讨,展开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为期三天的论辩围绕如何成为圣人的核心议题展开。朱子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近观博闻而后归约,尊崇“道问学”。陆氏兄弟主张“发明本心”,以为读书不是成圣贤的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认识本心然后道理贯通,是为“尊德性”。当时,二陆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诗讽朱子读书解经为“支离”事业,自己的直发本心才是“易简”功夫。陆九渊反问朱子,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而成为圣贤?陆氏雄辩滔滔致使朱子不及反驳,此会不欢而散。

朱子归途经闽赣交界处武夷山桐木关时触景生情,意识到双方应求同存异,写下《过分水岭有感》:“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异并,应知合处同。”鹅湖之会后,朱子并没有停止对相关论题的思考,认为陆九渊只重视发明本心之顿悟,却不重视读书之渐悟,是“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三年后,朱子作诗和鹅湖寺陆子诗:“德义风流夙所欽,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后来,弟子们把朱子读书法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此六条反映了为学修德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法之大成,值得认真践行。

颀联“循理保家之本”体现了朱子将义理与日用相融合的立德思想。“理”可谓朱子哲学的核心概念,被视为宇宙与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一方面,“循理”要求我们要认识并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要遵守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弟子黄榦以“所教人以孝弟为人道之大端”阐明朱子立德思想对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视。

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作朱子的发明。事实上,《礼记·乐记》就有“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的说法。北宋理学家程颢和程颐认为“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把“天理”视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恒久而普遍的客观本体。二程的“天理”既可以理解为万物运行的规则,也是具有道德倾向的人伦之理,由此提出了“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的道德修养目标。

“存天理,灭人欲”本意是劝诫人们要有所节制,这和当时南宋社会生活奢侈风气有关。朱子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乃是反对过度的、不合理的欲望,对于人的正常需求是持肯定态度的。朱子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也就是说,符合一般的正常的人伦是天理,而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就是人欲了。

朱子认为遵循天理则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人性修养关键在于常常反思人心是否为天理所主宰。天理和人欲常是一方受制于另一方,有且只有一方为主宰即“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与人欲几微之间,我们只有通过积累善性来提升道德境界。若将后世基于统治需要所推崇的禁锢个人的自由的封建道德理解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全部内容,实是对朱子的误读与曲解。当前,强调节制过度的欲望,也为现代人明德守法提供了一

面内省心性的明镜。

颈联“和顺齐家之本”表明了朱子持有家庭成员关系对等的价值理念。朱子《家训》言及“仁、忠、孝、友、恭、和、柔、礼、信、敬、爱、尊”等德目,不仅规定了社会成员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也强调在家庭关系上要营造互以对方为重的和谐氛围。朱子认为父子、兄弟、夫妻等因角色不同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要求不同,但彼此之间则承担着相互对等的道德义务。朱子提倡父慈于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与为人诚信等,旨在构建一个家庭和谐、相互依存的日常生活共同体。

朱子遣长子朱塾到浙江金华拜师吕祖谦门下,望其能学有所成,作《训子帖》寄语殷切勉励。朱子所导儿子踏实为学,更交代了许多日常道德修养和待人接物的细节,爱子情切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这是朱子家庭教育严慈相济的立德之方法。

相传,朱子到女儿家做客,正值女婿外出,朱子为避免女儿因家贫无所招待父亲而愧疚,写下充满慈爱的诗句以慰籍女儿,他说:“慈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通过这首广为流传的家教诗,我们感受到朱子宣扬亲情的温暖,家庭生活之乐并非全然基于对物质的追求。朱子提倡家人彼此体贴、互相关心,也是一种家庭美德。亲爱之情的升华体现了个人面对世界最核心的内在情绪,透过“家”的和乐之情,个体生命的通达也有了温情的延续,这是纯粹的物质富裕无法满足的。

尾联“勤俭治家之本”表明朱子立德实践不仅局限于个人家族之内,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朱子通过编撰家礼、创建祠堂、创办社仓等实践,推动民众对平等、安乐生活的追求。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指出,朱子推行民间通行之礼,使庶民在礼乐文化上免遭歧视,这种作为“士庶通用”《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子平等观念有关。朱子不以阶层为分界,而是以立德为学为导向,不断打破宋代士族阶层的礼仪垄断。



尤溪县博物馆“四个之本”板联

(梁文斌供图)

朱子家礼、祠堂、祭田等建制给予民间礼仪承载道德情感合宜的实践表达。朱子综合宋儒关于家庙的诸多观点而发明士庶通用的“祠堂”,他说:“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祠堂为家族礼仪活动提供了场所,此外祭田制度的设立,使得家族祭祀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由此,家

庭伦理道德通过“报本反始”的日常礼仪得到展演。从“四个之本”可见朱子立德思想有着不为政治统治范畴所涵盖的文化内涵,其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家风族风的塑造以及社会伦理的建构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后经由官学的传播,对后世道德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台湾新竹花翎侯建拱辰郑树南敬献楹联:“世界大千,瞻微笑道容,愿众生皈依此地。法门不二,礼圆隆宝相,看名山高占全闽。”天王殿有弥勒佛,笑口常开,故上联以“微笑道容”言其广纳大千众生。下联则言,人得鼓山可寻不二法门,礼庄严佛像,访名山圣地。

在大雄宝殿,有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季秋台湾信众敬献的两副楹联。一副为台南彰化林本堂敬献:“象教海滨来,主讲水鱼喧十地。龙灵天半伏,探奇石鼓冠三山。”上联写涌泉寺香火鼎盛、佛法大兴;下联述灵峤法师收毒龙之事,言鼓山之奇冠福州。另一副为台南彰化林锦荣敬献:“青简遍传,历唐宋元明,天兴象教。绿环环绕,合东西南朔,佛镇龙灵。”上联言涌泉寺历史渊源,下联述涌泉寺景物传说。

另有楹联三副。一副在韦驮龕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台湾基隆许松泉、许松英合献楹联:“护法安僧,亲受灵山咐嘱。降魔伏怨,故现天将威风。”楹联对仗工整,道出韦驮护法天神的身份与其降魔伏怨之勇猛。两副在山门亭石柱。1913年阳月谷旦,台湾阿猴新东势信士李盛福敬献、释今香敬书:“弘菩提之愿,开入圣之门。”1913年阳月谷旦,台湾台南厅武庙街信女林朝姑敬献:“石鼓喧海岛,灵泉润寰区。”联中“海岛”即为宝岛台湾,“寰区”为人世间。此联在感叹山寺灵秀的同时,也表达涌泉寺传佛法至台湾,传妙法与世人之意。

从1882年到1913年,这六副楹联跨越了动荡不安的30年,在台湾被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当时的台湾人民仍保持着和大陆的联系,将朝礼圣山、国泰民安的新愿寄托于楹联之中。

鼓山的摩崖石刻有“东南碑林”之称,拂观石刻,其中不乏台湾人留下的书迹。灵源洞下有喝水岩,因五代僧神晏叱喝西涧之水而逆流东涧而得名。清乾隆壬午年(1762年),台南王在镐、何希梁也以“喝水”为题材作诗,刻于崖壁。台南王在镐题行书:“水返前溪去,云仍岩下留。僧归啼鸟夕,声色未全休。”描绘涧水逆流,云横岩下,僧人晚归,啼鸟相伴之胜景。台南何希梁题行草书:“水流因喝返,千古绝喧喧。犹有悬崖瀑,还从雨后来。”直言尽管此处水流因喝而退,但雨后仍有瀑布自悬崖落下。

更衣亭西侧,有“宏法利生”摩崖石刻,下款“民国甲子年四月”“衲善慧书”。善慧法师出生于台湾基隆,礼景峰和尚为师,在涌泉寺受具足戒。民国甲子年(1924年),涌泉寺传授三坛大戒,善慧法师从台湾灵泉寺至涌泉寺担任羯磨阿阇黎。此石刻系善慧法师于戒期结束时,以弘法利生自勉所刻。

达摩洞边西向,1933年台南法华寺住持善昌法师与基隆灵泉寺住持德馨和尚回鼓山礼祖,为纪念善慧和尚出家30年,同凿石“无孔铁锤”。另有题刻碑记,其书写者虽非台湾人,但与台湾有密切联系。法室内,有镇守福州将军庆霖、台湾府知府庆保二人题刻匾额“宝瑤庄严”,上款“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仲秋吉旦重修,光绪甲申孟夏再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此匾由满族镶黄旗人庆霖、庆保所立,正是闽台亲密关系之印证。